

密斯·凡·德·罗和“最低限度住宅”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Minimal Housing

熊庠楠

XIONG Xiangnan

摘要：探讨 20 世纪 20 年代晚期德国大力建设社会福利住房的背景下，建筑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对住房问题的核心立场。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住房短缺的紧迫问题，现代建筑师提出了“最低限度住宅”的概念，并在“新法兰克福”社会住房项目中实践。而密斯反对“最低限度住宅”理念。在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和建筑师西格弗里德·埃贝林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他坚持艺术关怀位于建筑价值排序的首位，并强调住宅的首要价值是维护、支持人们内心世界的发展。

通过梳理“最低限度住宅”概念的发展和应用，揭示其内在结构中经济效率和文化价值的动态博弈。同时交叉分析密斯的写作和阅读，展现其对现代住房空间的思考，更细腻、深入地探讨密斯的建筑理论发展，并揭示出现代主义建筑在其发展初期作为社会干预手段和作为精神文化追求两条道路之间的冲突张力。

关键词：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最低限度住宅；新法兰克福；赫尔穆特·普莱斯纳；西格弗里德·埃贝林

Abstract: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architectural principles of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concerning housing during the late 1920s, a period marked by Germany's intense focus on social welfare housing construction following World War I. While many German modern architects advocated for “minimum housing” as a solution to housing shortages, Mies took a dissenting stance. Drawing influence from the sociologist Helmuth Plessner and architect Siegfried Ebeling, among others, Mies argued that artistic value should occupy the highest position in the hierarchy of architectural values. He emphasized that housing's primary purpose should nurture and facilitate the inner development of its occupants.

By scrutinizing the evolu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minimum housing” concept, this paper uncovers the intricate interplay between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embedded within its framework. Through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Mies's writings and intellectual influences, it elucidates Mies's distinctive perspective on modern domestic spaces and contributes to a more nuanced understanding of his architectural theory. Furthermore, it highlights the tensions inherent in modernist architecture, which oscillates between serving as a tool for social intervention and a vehicle for cultural enrichment.

Keywords: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minimal housing; neue Frankfurt; Helmuth Plessner; Siegfried Ebeling

【文章编号】2096-9368(2023)04-0071-06

【中图分类号】TU-09

【文献标识码】A

【录用日期】2023-07-25

【作者简介】

熊庠楠，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现代建筑研究。

1929年2月，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在给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信中写道：“尤其在以条理和秩序著称的德国，我觉得有必要特别强调建筑不仅仅是原始的功能主义。”^①“原始的功能主义”是指将功能需求和社会经济现实的客观分析作为建筑设计的最主要考虑因素。密斯对这种思维方式感到忧心，而勒·柯布西耶亦对此感到无奈。他的著作《走向一种建筑》在1923年出版后，1926年被翻译成德文广泛传播，也引发了广泛的误解。在大多数读者看来，《走向一种建筑》强调了功能和结构在建筑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们将该书视为功能主义建筑的主要推动力。然而，这并非勒·柯布西耶的本意。尽管他在书中明确将建筑定义为“一种艺术事实，一种超越结构问题的情感现象”，读者往往却忽略了这一部分的内容。^②令勒·柯布西耶特别沮丧的是，书中关于“住宅是居住的机器（Wohnmaschine）”的提法成为当时功能主义流行口号——这是他不曾预料到的影响。

勒·柯布西耶试图消除这种误解。1929年4月，德意志制造联盟的主办刊物《形式》（*Die Form*）转载了勒·柯布西耶题为《建筑从何开始》（“Wo Beginnt die Architektur”）的文章（图1）。文中他强调，艺术作品——包括建筑——的目标是通过提供“自由和选择唤起人性的

体验”。根据这个标准，他批评了以机器为灵感和以功能为导向的住宅，因为这类住宅很少关注人们的情感体验和精神需求。为了纠正《走向一种建筑》所带来的理解偏差，勒·柯布西耶辩称：“如果一座‘居住的机器’不能提供任何精神滋养，就应当被抛弃。”^③

无论是密斯还是勒·柯布西耶，均对功能主义在建筑设计中的盛行持警惕态度。与此同时，德国正面临住房短缺的紧迫问题。基于追求效率的功能主义原则，德国的现代主义建筑师们提出了“最低限度住宅（die Wohnung für das Existenzminimum）”的概念，并在社会住房项目中广泛实践。本文追溯“最低限度住宅”的发展和应用，探讨其中经济效率和文化价值的动态博弈。同时，通过梳理密斯对住房问题的核心立场，分析对他产生影响的社会学家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和建筑师西格弗里德·埃贝林（Siegfried Ebeling）的思想著作，以期更深入地探讨密斯对现代住宅空间的理解。并由此展示出20世纪初现代主义建筑作为社会干预手段与作为精神文化追求两条道路之间的冲突张力。

1 “最低限度住宅”概念和发展

功能主义建筑的思想根源来自于“新客观性（neue Sachlichkeit）”的概念。1925年，曼海姆艺术馆馆长古斯塔夫·哈特劳布（Gustav Hartlaub）创造“新客观性”一词，作为他正在筹备的先锋艺术展览的标题。这一概念描述了当时艺术家们的一种新的创作趋势——他们专注于“即时体验”，“以完全客观的视角看待事物”，坚定地立足于现实，拒绝夸张的表现主义和空洞的理想主义。随着“新客观性”艺术展览在全国巡回，“新客观性”一词迅速传播开来。它十分贴切地描述了战后德国一种盛行的态度，即不带感情色彩、冷静地面对现实。随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败北，人们战前的热烈希望接二连三地破灭，这个术语恰如其分地表达了当时部分人群的精神风貌。从而，“新客观性”这一概念迅速应用于文学、音乐和造型艺术等多个领域。^④

在建筑领域中，新客观性意味着一种特定的设计思路，即建筑形态应从对项目需求的务实分析中产生。在这样功能主义的思维框架下，建筑师们认为住宅的解决方案应该以确切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基础，并在技术上具有较高可操作性。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师们将功能主义的思路方法融入他们的工作中。其中许多人，如亚历山大·克莱因（Alexander Klein）、马特·斯坦姆（Matt Stam）和恩斯特·迈（Ernst May）等人，为解决德国当下住房困难的紧迫问题，提出了“最低限度住宅”的概念。^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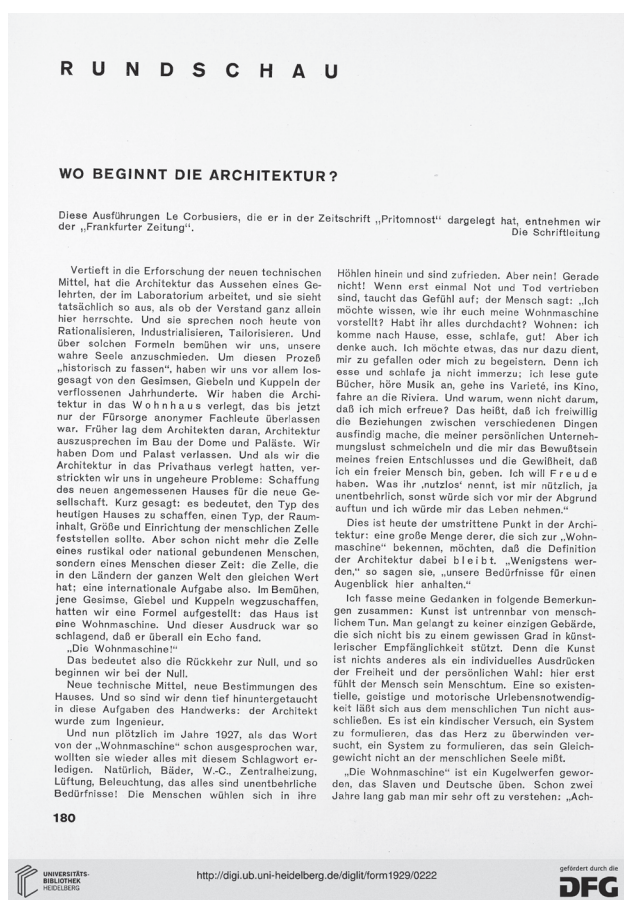


图1 文章《建筑从何开始》

① 通信，Mies to Le Corbusier, February 1929, 巴黎，勒·柯布西耶基金会（Foundation Le Corbusier），EI-20。转引自 Richard Pommer,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Modern Movement in Architecture*。

② 详见 Alexander Klein, *Grundrissbildung und Raumgestaltung von Kleinwohnungen und neue Auswertungsmethoden*; Matt Stam, *Scale-Right Scale-Minimum Scale*; Ernst May, *Die Wohnung für das Existenzminimum*。

求——为居民提供赖以生存所必需的空气、光线和空间，仅限于此。其设计方法主要基于对基本需求的计算，然后将这些数据信息转化为建筑形式。在住房严重短缺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多数德国现代主义建筑师认为“最低限度住宅”方案紧急且恰当。在 CIAM（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的创始会议上，当法兰克福建筑师恩斯特·迈提议以“最低限度住宅”作为下一次会议的主题时，获得了一致赞同。

CIAM 于 1928 年在瑞士的拉萨拉古堡（Chateau de la Sarraz）成立，旨在推动欧洲的现代建筑事业。该组织定期举办会议，为建筑师们提供一个讨论现代建筑和城市规划发展等议题的平台。CIAM 的第一次会议是筹备会议。从而，“最低限度住宅”成为 CIAM 首个主题会议，定于德国法兰克福召开。在迈的主导下，该城市的公共住房计划“新法兰克福（neue Frankfurt）”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1925—1930 年期间，“新法兰克福”建造了超过 16000 套住宅。

作为法兰克福市的市政建筑师（Stadtbaurat）和城市规划部门的负责人，迈在该市及其周边地区几乎所有的建筑工程项目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当时市长路德维希·兰德曼（Ludwig Landmann）的大力支持下，迈有机会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实验，并以此为契机建造了大量“最低限度住宅”。^[4]这类住宅的房间尺寸通过精确计算而确定，以满足人们最必要的生活需求，并通常内置家具，以适应有限空间。

对于迈和许多德国建筑师而言，“最低限度住宅”不仅是解决严重住房短缺问题的必要方案，同时也传递出更简单、更有效率的现代生活观念，为改革家庭生活创造了机会。1924 年，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 Taut）在他的著作《新住宅，女士创造》（*Die neue Wohnung, Die Frau als Schöpferin*）中主张将科学管理思想应用于室内布置，强调高效简洁的住宅会为人们带来更平和、愉悦的心态。^[5]同样，斯坦姆在一篇讨论“适当尺度标准”的文章中辩称，恰如其分的尺度更人性化，且反映了诚实、不矫揉造作的现代理念。他进一步指明：家具和生活器具应按照满足使用需求的最小尺寸设计；对于房间和住宅而言，适当的尺度标准即为“满足需求，毫无冗余”的尺度。^[6]

但本质上来看，“最低限度住宅”仍然由经济问题驱动。现代生活观念的渗透只是锦上添花的附属作用之一。在《新住宅，女士创造》一书中，陶特主要探讨将科学管理思想用于室内设计的经济效应——强调在满足相同需求的前提下，这样的布置能够缩减住宅的尺寸和成本。^[7]斯坦姆甚至提出衡量设计尺度是否恰当的标准之一是该设计是否“在最低造价允许范围内”。^[6]同样，迈在月刊《新法兰克福》（*Das Neue Frankfurt*）的发刊词中定下基调，刊物的目标是推动利用新的设计方法打造现代都市，其中特别关注城市的经济问题。^[7]

自 1929 年开始，随着德国经济状况大幅恶化，“最低限度住宅”概念的经济本质变得更加突出。建筑师们先前



图 2 《新法兰克福》特刊“最低限度住宅”的封面（1929 年 11 月）

（Institut für Stadtgeschichte Frankfurt, archive SD3 NR.59, Hans and Grete Leistikow）

试图在文化理念与经济需求之间取得平衡的尝试日益被纯粹的造价考量所取代。在法兰克福，成本和效益成为评估住房规划和设计成果的重要指标。城市的反对派质疑甚至批评迈的建筑技术和风格选择缺乏经济造价的审慎考虑，造成了不良的经济后果。^[8]在巨大的政治、经济压力下，迈被迫寻求降低建筑成本的方法。他采用了更加单调的规划，选用的住宅类型也比之前更少，并更大规模地采用批量生产的建筑构件。^[9]此时，迈及其团队对生活文化改良的设计思考在很大程度上被控制成本的无限诉求所取代。

为配合在法兰克福举办的 CIAM 会议，《新法兰克福》杂志发布了一期题为“最低限度住宅”的特刊。在封面上，黑白背景上醒目地以红色标注的“低廉住房（billige Wohnungen）”一词，暗示着住房的成本造价是问题的核心（图 2）。“最低限度住宅”最初作为致力于协调住房问题并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多方面因素的综合方案，现在被降低成本的策略所主导。^[9]此时的法兰克福，经济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建筑结果。

迈及其团队甚至将设计选择问题上升到道德高度。斯坦姆宣称在广大工人群体的最低生活标准未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任何有装饰或过度的设计都导向“一种令人不齿、反社会的生活方式”。^[6]迈相对委婉，他通过比较的方式表达类似立场：“如果我们问那些渴望并急切需要住房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否愿意忍受这样一种情况，即少数人享有宽敞的住房，而大多数人则在困苦中继续等待；还是说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个低标准住宅，空间有限但能够满足对现代住宅的基本期望吗？如果这（后者）能确保在短时间内消除住房短缺，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9]

① 恩斯特·迈，CIAM 会议文章《最低限度住宅》（“Die Wohnung für das Existenzminimum”）。转引自 Hilde Heynen,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 第 49 页。

此时,“最低限度住宅”已脱离了传递现代生活观念的主旨,而是如建筑史学家希尔德·海嫩(Hilde Heynen)敏锐指出那样,变成了一个“两害相权衡”的无奈选择。^{[9]49-50}要么为少数人提供宽敞舒适的住房,要么为大多数人提供低标准住房。而迈认定后者为更好的选择。

迈的立场很大程度上代表了 CIAM 成员们的普遍态度。凝聚 CIAM 成员的共识之一是将建筑设计视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就住房问题而言,大多数现代主义建筑师认同在有限条件下为尽可能多的人群提供简易住房的方案。大多数现代主义建筑师也都热情地参加以“最低限度住宅”为主题的 CIAM 会议。建筑师维克多·布尔卓(Victor Bourgeois)、汉斯·施密特(Hans Schmidt)、勒·柯布西耶和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发表了主旨演讲。其中,布尔卓探讨了“最低限度住宅”的设计规范;施密特和勒·柯布西耶关注“最低限度住宅”的平面布置和相关技术问题;格罗皮乌斯提议以高层集合住宅来解决住房紧缺的问题。这次会议受到了广泛关注,来自 18 个国家的大约 130 名建筑师出席了 1929 年 10 月 24 日的开幕式。^[10]

密斯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他从未担任 CIAM 委员,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是 CIAM 的正式成员。他的参与度也不高。在他 1938 年离开欧洲之前,CIAM 共召开了五次会议,而他只参加了 1930 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三次会议,主题是“理性土地开发”,且他几乎没有发言。或许在与 CIAM 成员的接触中,他发现自己与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对于建筑的价值排序存在根本性分歧。他不认为经济原则是建筑设计的决定性因素。

在密斯的建筑价值排序中,艺术价值占主导地位。他认为艺术价值是“属于精神范畴,从而独立于任何时期的物质条件”。^[11]对经济造价的日益强调,在他看来是将建筑简化为纯粹的物质问题,而忽略其核心的文化价值。在一次广播报告中,他强调道:“即使功能和经济是建筑的先决条件,建筑的终极问题是个艺术性的问题。无论功能和经济因素对建筑有多大的影响,它们对艺术价值几乎没有贡献。”^[12]在这样的价值框架下,密斯对“最低限度住宅”的概念毫无兴趣。他曾告诉图根哈特太太(图根哈特别墅的业主),一个房间的理想尺寸永远无法计算,它取决于人们在房间内静止和走动时的感受。^[12]显然,密斯不认同“最低限度住宅”基于计算的空间处理方法。

2 社区蓬勃,边界消退:至关重要的个人空间

在更深层次上,密斯对住宅空间和文化精神相互关系的理解受到当时活跃在社会思想领域的学者和艺术家的复杂而微妙的影响。其中,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普莱斯纳对社区意识形态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密斯对集合住宅的

立场。普莱斯纳观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大众中产生了日益强烈的回归社区生活的愿望,并发展出高度理想化的社区理念。他试图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及其潜在后果。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 1924 年出版的专著《社区的边界:对社会激进主义的批判》(*Grenzen der Gemeinschaft: Eine Kritik des Sozialen Radikalismus*, 后称《社区的边界》)中。

《社区的边界》发展了“社区和社会”的学说。德国社会学和经济学家费迪南德·托尼斯(Ferdinand Tönnies)在 1886 年发表的专著《社区与社会》(*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中开启了关于社区和社会的主题讨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托尼斯的定义,社区的概念主要应用于描述前工业化的村庄,指的是基于相互信任和趋同的价值观念而共同生活的人群。相较而言,社会的概念与城市和资本主义经济兴起的环境相关,指的是由利益联系的人群。托尼斯认为,在社区中发展而来的关系自然、亲密且持久,而社会关系则短暂、人为且往往建立在金钱联系的基础上。

普莱斯纳的理论基于托尼斯的著作,但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否定托尼斯将社区和社会视为从不同历史背景发展而来的线性框架,而认为社区和社会在大多数情况下共同存在。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高度发展的社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为理想化和过度美化的观念,作为幻想的安慰剂来驱散现代性的冲击。在他看来,人们对社区的广泛怀旧情结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社会动荡的政治氛围、恶劣的经济状况和绝望的生活条件的逃避反应。他特别强调,对社区生活的渴望在本质上是否认现实,它无法抵抗任何现实的挑战,更无法解决任何真正的问题。

《社区的边界》揭示了社区意识形态的弊端。普莱斯纳指出,社区的创建依赖于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和高度融合,这个过程消除了多数人(尤其是城市居民)所渴望的距离感。普莱斯纳认为,人们无法忍受过于亲近的距离,他们在社交生活中需要保持一定的伪装,在私人生活中需要个人空间释放自我。因此,社交距离在现代社会交往中不可或缺,它能够调和紧张的环境,维持个体精神的活力。他通过描述社区中的生活场景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白天,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人们不得不忍受在工作中与其他人紧密接触的环境;然而,即使工作结束后,社区生活仍然迫使他们与周围的人们互动,无法得到放松。普莱斯纳警告说,这样压缩距离的社区生活将扼杀个体的发展。他生动地描述这种情况为:“放弃自我是加入社区的入场券。”^[13]

普莱斯纳对社区怀旧的批判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当时兴建的集合住宅项目。这些项目大都致力于创造一种亲切、居民高度融合的社区感。在部分社会住房项目中,建筑师采用了更极端的“最低限度住宅”方案,将厨房、洗衣等基本居住功能设置在公共区域,从而迫使居民共享部分生

① 1931 年 8 月 17 日,密斯广播讲稿;Dirk Lohan 的私人收藏。讲稿全文刊印于 Fritz Neumeyer, *The Artless Word: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 第 311 页。

② 1931 年 8 月 17 日,密斯广播讲稿;Dirk Lohan 的私人收藏。讲稿全文刊印于 Fritz Neumeyer, *The Artless Word: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 第 311 页。

活功能空间，并期待他们能利用这个契机与邻居交流。在普莱斯纳看来，这种强制的社交生活瓦解了个体之间的必要距离，抑制了个人思想文化的发展。

《社区的边界》否定了 19 世纪末以来许多人怀抱的社区理想，引发了广泛的争议。1932 年，在德意志制造联盟成立 25 周年之际，普莱斯纳受邀发表题为《技术时代的形式重生》（“Wiedergeburt der Form im Technischen Zeitalter”）的演讲。普莱斯纳总结道，前工业化时代的所有风格都指向一个完整的形式。这些形式基本可以看作是“封闭的形式”——被动、静态、无法与现代技术时代的内在精神相适应。他强调，新的机械时代的潜在逻辑要求一种与以往任何时代都不同的视觉意识。它需要培养出一种“开放的形式”，它应是动态的、开放的，并促进形式与使用者之间的活跃互动。^[14]

密斯认识普莱斯纳。在担任包豪斯校长期间，密斯曾邀请普莱斯纳来包豪斯发表演讲（遗憾的是，普莱斯纳的报告讲稿已遗失）。^①通过这一事实，可以合理推测密斯曾阅读普莱斯纳的著作，或者至少了解普莱斯纳社会理论的核心思想。普莱斯纳对社区理想的批判帮助密斯明确了自己关于现代住宅的观念立场。在魏森霍夫住宅展览（Weissenhof Housing Exhibition）期间，有评论批评密斯设计的公寓浪费空间。在与朋友的私人对话中，密斯反驳道：“我们又不是老鼠，住在老鼠洞里。如果人们遭受这样的挤压，他们身心都会变得更狭小。相反，如果给予人们呼吸、行走和生活的空间，他们会成为更好的人——最终，这种方式可能比将他们视为老鼠一样对待更好地解决社会问题。”^[16]对密斯而言，住宅不仅仅是提供避风遮雨之所，住宅帮助个人回避公共生活中对个人产生的消耗。只有身处隔离在公共生活之外的个人空间中，人们才能够与自己的内在世界相连接，重新收集、过滤记忆，培育自我。现代住宅是这种至关重要个人发展的核心场所，因此密斯认定它值得倾注创造力且不惜代价。

在应对住房问题上，密斯在建筑师埃贝林的著作《薄膜般的空间》（*Der Raum als Membran*）中找到了共鸣（图 3）。1922—1925 年期间，埃贝林曾在包豪斯学习。他赞赏包豪斯早期的表现主义课程，而对格罗皮乌斯在 1923 年将学校方针重新定位为设计与工业生产的高度融合感到失望。随着学校越来越专注于经济造价、标准化生产和功能主义等方面问题，埃贝林在 1925 年离开了包豪斯，并在一年后完成了《薄膜般的空间》一书。尽管这本书在包豪斯所在城市德绍出版，但它并不属于包豪斯的出版物。此外，埃贝林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包豪斯，使得许多包豪斯成员感到不悦，从而忽视埃贝林及其作品。因此，《薄膜般的空间》在当时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反响。^[15]

然而，密斯饶有兴致地阅读了《薄膜般的空间》，并做了许多批注。埃贝林批判盛行的功能主义住宅观念，谴责



图3 《薄膜般的空间》封面

“最低限度住宅”的概念将居住问题简化为纯技术问题。他担心缺乏精神维度的住宅会将人们导向浅薄而轻浮的生活。大约在同一时间，密斯表达了类似的想法，他写道：“公寓是一种使用物品，……它与什么有关？显然只与物质存在有关……但是人也有自己灵魂的需求，这些需求无法仅通过确保他不会撞墙（的设计）而满足。”^②

埃贝林对建筑空间的高远见解尤其触动密斯。在埃贝林看来，现代空间的核心任务是支持人类对精神世界的永恒需求，将人们的内在世界与外部苍穹相连。他强调，不论任何年龄阶段，人类都需要思考的空间、与内心对话的空间、与自然苍穹相连的空间。埃贝林以诗意的方式描述了这种空间：“它是为了自由舞动和（表达）对生命狄俄尼索斯般的狂热或绝对专注而存在的空间；一个进行神秘仪式的场所；一个默然仰望星空的地方。”^[17]埃贝林强调，无论其形式如何随时间变化，这些精神时刻都在人类的内在生活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所有时代的建筑师都有义务创造能够激发人类精神的空间，帮助人类与世界建立更深刻的联系。

3 结语

在普莱斯纳和埃贝林的思想影响下，密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半叶更加专注于解决住宅空间精神维度的问题。他不像其他现代主义建筑师那样关注建筑的社会和经济价值。总的来说，密斯不相信建筑能够解决社会问题。在一次采访中，他提到社会问题并非建筑的核心问题，因此建筑师不应该对此负责。^[18]此外，在他看来，严峻的经济条件不应该成为建筑文化追寻的阻碍，因为艺术追求表达的是精

① 通信，Otto Bauer to Mies, 31 Aug. 1932，密斯凡德罗档案，美国国会图书馆（Papers of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Manuscript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关于普莱斯纳对社区理念的批判及其对魏玛德国现代建筑发展的影响，参见 Volker M. Welter, *The Limits of Community – the Possibility of Societ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Weimar Germany*。

② 密斯的笔记本，第 22 页。刊印于 Fritz Neumeyer, *The Artless Word: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 第 274 页。

神内核，“独立于时代的物质条件之外”。他强调，在物质匮乏的时期，更不能放弃艺术的追求，因为我们“不能在物质损失上再增添文化损失”。^①

基于这样的思想框架，密斯重新审视住宅空间的核心内涵，获得了与其他建筑师截然不同的结论。对他而言，住宅不仅仅是一个遮风避雨的物理空间，它承载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应当被设计得与这一崇高作用相称。在这种追求下，密斯探索能够联系内心世界和外在苍穹的住宅空间，创造了图根哈特别墅^②（图4）。



图4 从图根哈特别墅（1929年）起居楼层望向布尔诺老城全景，布尔诺，捷克共和国
（作者自摄）

参考文献

- [1] LE CORBUSIER. Toward an Architecture[M]. GOODMAN J, trans. Los Angeles: 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2007.
- [2] LE CORBUSIER. Wo beginnt die Architektur[J]. Die Form, 1929, IV(7): 180-181.
- [3] SCHMALENBACH F. The Term Neue Sachlichkeit[J]. The Art Bulletin, 1940, 22(3): 163-164.
- [4] BULLOCK N. Modern Design and Municipal Patronage: Frankfurt 1024—1930[J]. Oxford Art Journal, 1979, 2(2): 21-24.
- [5] TAUT B. Die neue Wohnung. Die Frau als Schöpferin[M]. Leipzig: Verlag von Klinkhardt und Biermann, 1924.
- [6] STAM M. Scale-Right Scale-Minimum Scale[J]. Das Neue Frankfurt, 1929, 3(2): 29-30.
- [7] MAY E. Das neue Frankfurt[J]. Das Neue Frankfurt, 1926, 1(1): 3-4.
- [8] LIEBERMAN B. Testing Peukert's Paradigm: the 'Crisis of Classical Modernity' in the 'New Frankfurt', 1925—1930[J]. German Studies Review, 1994, 17(2): 297-299.
- [9] HEYNEN H. Architecture and Modernity: A Critique[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9.
- [10] MUMFORD E. The CIAM Discourse on Urbanism, 1928—1960[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 [11] NEUMEYER F. The Artless Word: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1.
- [12] TUGENDHAT 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ugendhat House[M]// HAMMER-TUGENDHAT D. Tugendhat House: 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Basel: Birkhäuser, 2015: 18-23.
- [13] PLESSNER H. The Limits of Community: A Critique of Social Radicalism[M]. WALLACE A, trans. Amherst: Humanity Books, 1999.
- [14] PLESSNER H. Rebirth of Form in the Technical Age[J]. BLOWER J, trans. Art in Translation, 2011, 3(1): 37-51.
- [15] SCHEIFFELE W. Membrane and Ecological Architecture[M]// EBELING S. Space as Membrane. Pamela Johnston, trans.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2010: I-XII.
- [16] RICHTER H. Begegnungen von Dada bis heute; Briefe, Dokumente, Erinnerungen[M]. Köln: DuMont, 1973.
- [17] EBELING S. Space as Membrane [M]. JOHNSTON P, trans. London: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2010.
- [18] MIES VAN DER ROHE. Conversations with Mies van der Rohe[M].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8.
- [19] POMMER R. Mies van der Rohe and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he Modern Movement in Architecture[M]// MIES VAN DER ROHE: Critical Essays. Franz Schulze, ed. Cambridge: MIT Press, 1989.
- [20] KLEIN A. Grundrissbildung und Raumgestaltung von Kleinwohnungen und neue Auswertungsmethoden[M]. Berlin: Zentralblatt der Bauverwaltung, 1928.
- [21] MAY E. Die Wohnung für das Existenzminimum[J]. Das Neue Frankfurt, 1929(11): 209-212.
- [22] WELTER V M. The Limits of Community – the Possibility of Society: On Modern Architecture in Weimar Germany[J]. Oxford Art Journal, 2010, 33(1): 63-80.
- [23] XIONG X. Mies at Home: From am Karlsbad 24 to the Tugendhad House[M].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 2022.

① 1931年8月17日，密斯广播讲稿；Dirk Lohan的私人收藏。讲稿全文刊印于Fritz Neumeyer, *The Artless Word: Mies van der Rohe on the Building Art*, 第311页。

② 更多关于密斯如何在图根哈特别墅中创造具有精神维度的空间，其采用的空间策略及其灵感来源，请见：Xiangnan Xiong, *Mies at Home: From am Karlsbad 24 to the Tugendhad House*, 第141~172页。